

日本丝印考

[日] 久米雅雄 撰

季忠平 译

内容提要：本文是有关“神秘丝印”的探索研究。对象是明代时伴随着从中国进口的生丝一起流入日本的那些印章。这些印章的印面，有长方形、椭圆形、方形、圆形等各种形状；其钮形，也有狮、虎、龙、龟、象乘人、昆仑人、寿星、大黑天、蛭子（“大黑天”与“蛭子”都是日本神话人物）等多种样式；而其印文，则既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是图形的。不仅有些汉字的印文难以判读，即使是图形的也有不少不易理解。此外，从印文、图形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不少同一内容重复的情况，这一点也被认为并不符合印章的特点。至于其功能与用途，现在也众说纷纭，分别有书镇说、玩具说以及坠子说等多种说法。

要说到“日本的丝印研究史”，则首推江户时代的安田箕山的《古铜印汇》（1766年）以及田龙亭的《古铜印谱》（1772年）。不过，当时对于钮形只是用文字来作描述，印谱也不分汉字和非汉字或是图形，就那样混杂在一起登载出来。到了明治时期，在横井时冬的《丝印之考》（1905年）中，第一次出现了作为学术用语的“丝印”的称呼。三村竹清在《丝印百钮》（1908年）中，尝试描绘钮图，并根据钮形的区别来对丝印作系统的分类。不过，因为是以钮形为线索所作的分类，所以从印文的角度看，汉字和非汉字或是图形的丝印也还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同时也没有印文的释文以及对图形的解释。进入昭和时代，金工大师会田富康在战后撰写了《铸金、雕金、锻金》（1975年）等书，用照片的方式对丝印作了介绍，并以深入的考证，首次提出“坠子说”。其后，随着新关钦哉的《丝印之谜》（1979年），富冈美术馆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等的《神秘的丝印》（1993年），大内丰春的《丝印及其周边》（1993年）以及梅舒适的《丝印集英》（2005年）等论著的出版，有关丝印的研究渐渐走向深入。

本文是笔者在整理迄今为止的日本丝印研究的成果及问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个人对于丝印研究的一点管见。文章认为，要揭示丝印的本质，对于汉字印和非汉字印或图形印都应重视，不可偏废。文章对汉字印、非汉字印或图形印以及钮形等各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丝印的系统，与辽宋元以来的中国（明清）、西域、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文章对丝印的时代性（制作年代及流通年代）、丝印的名称来源、日本丝印的功能用途、锁国时代丝印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以及近年发现的新资料等作了说明，并对本专题今后研究的课题及展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丝印 日本丝印研究史 成果与问题 汉字丝印 非汉字或图形丝印 系统渊源 名称来源 功能用途 新资料 课题展望

一、序 论

在日本，有称之为“丝印”的印章。《国史大辞典》（1979年吉川弘文馆）载：“因为是与丝有关系的印章，所以才有了这个名称。十五世纪时，我国从明代中国进口生丝以织成织物时，每一斤生丝附有一个印章，在到货的时候，检查过斤量，在收据上用这个印章捺印后再交给对方，作为交易的凭证。在这一过程中，印章不交还给原有者，而是由收货人收留，因此过后集中在一起，数量众多，也不再有什么用处。这样的明印是铸铜印，就印形而言都有钮，钮形则包括狮、虎、龙、猿、犬等不乏想象成分的动物，此外也有人物；印面有圆形、方形等各种形状，总之是富有雅趣的物品，被喜爱者赏玩，十五世纪后也被用于捺印。”（荻野三七彦）同年，新关钦哉也在《史窗余话》的《丝印之谜》中认为：“丝印曾被称作干支印或钮印，钮多数作狮子等动物的形象，另外都开有较大的孔洞。这些印章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印面上所刻文字似乎应该是汉字，但无法释读的占了多数。此外，同样的印文屡见不鲜。从这些方面来看，不得不承认丝印似乎不符合印章的特点。丝印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遗留下来？中国人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无法释读的文字？类似这样的疑问至今无法解答。”

本文的内容，首先是对“丝印的研究史”作综述，指明“丝印研究的成果及问题”，确定适当的“方法论”，利用汉字印及非汉字或图形印作为研究资料，通过讨论“丝印究为何物”、“丝印的系统性”、“丝印的时代性”、“丝印的名称起源”、“丝印的功能与作用”、“丝印在日本的发展以及其后的演变”等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尝试将丝印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

（一）江户时代研究史

1. 安田箕山《古铜印汇》（1766年）（图1）

明和三年（1766），京都安田箕山在《古铜印汇》一书中，同时刊载了汉字印和非汉字印两种印章。图1共登载有6颗，印面有长方形、椭圆形、矩形、圆形等多种，包括汉字印以及图形印或者记号印。上排左起，分别著录为“郑氏铜印骑马钮”、“封左文铜印狮钮”、“同不害异不伤铜印虎钮”。下排左起，分别著录为“龙铜印鳧钮”、“铜印人物钮”、“黻铜印兽钮”。不过，并没有登载钮图。

2. 田龙亭《古铜印谱》（1772年）（图2、图3）

明和九年（1772），土佐的田龙亭撰《古铜印谱》，登载了汉字印和非汉字印或图形印。图2上的汉字印，分别为“铜印虎钮 大明”、“铜印獬钮”（印文文字反写，读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丰臣秀吉公印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铜印骑马钮 郑氏（延平王名森字成功俗曰国姓爷）”、“铜印虎钮 同不害正异不伤物”、“铜印豹钮 不害正不伤物”、“铜印鼻钮 莫”、“铜印人物钮 星”、“铜印豹钮 再拜”等9颗。图3上的非汉字印或图形印，分别



图1



图2



图3

为“铜印 福禄寿钮”2种，“铜印鼻钮 外国人物”、“铜印鼻钮（龙纹）”、“铜印鼻钮 庄周梦”等，共6颗。印面分别有长方形、圆形、方形等形状，没有钮图。

3. 源惟良敬撰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1786年）（图4）

天明五年（1786），由源惟良氏敬撰的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中，登载了16颗汉字印章。图4是挑选出的其中8颗，钮式分别著录为“铜印兽钮”、“铜印象钮”、“铜印狮钮”、“铜印辟邪钮”、“铜印辟邪钮”、“铜印王面钮”、“铜印磬钮”、“铜印人马钮”。印面有长方形、方形、圆形等，没有释文和钮图。

4. 松平定信《集古十种》（1800年）（图5）

宽政十二年（1800），松平定信的《集古十种》中，登载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或图像印章。图5的左上，展示的是“丰臣秀吉公印二”，包括印文不明的书翰所印和“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印的古摹本。此二印都是圆形印面。排在其右边的，是刻有“丰臣行长印章”汉字方印，播磨国龙野中井伯元家藏。图5的右下，登载的是圆形的“凤蝶”图形烙印（播磨国姬路芥氏所藏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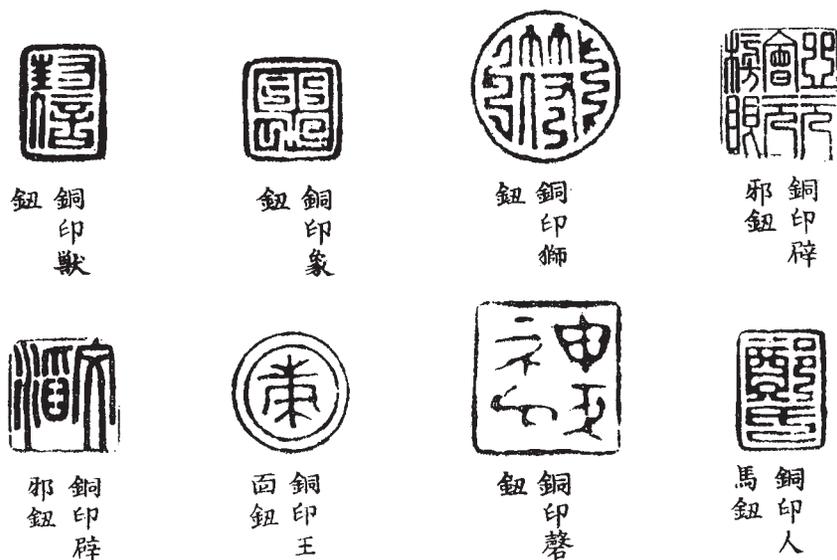


图4



图5

升中烙印)。值得注意的是图5左下方著录“下总国大寺乡堀地所得印钮”的人物钮，作为首次登载的钮图，非常珍贵。

5. 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1857年）（图6）

安政四年（1857），长谷川延年的《博爱堂集古印谱》收录了如图6所示的圆形、方形汉字印和非汉字或图形印。上面左边是统称为“丰臣太阁秀吉公印”两枚，一枚为“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以及一枚“印文难读”印。中间是“小西摄津守行长印”，附记为“材象牙，并河（中井）氏所藏印”、“按丰公征韩之日尝明人所赠云云”。右边是一枚不明文字印，附记为“全州长尾村小野氏藏印”。下面的左边是一枚刻有一只鸟形象的“柬埔寨国王王郑书简所用印”。右边是一枚刻有帆船图像的“和兰人书简所用印”，以及一枚刻有“VOC”字母的印章，附记为“全东印度通商诸器及书籍等所印”、“和兰刊本，月汐测算卷首所印，家藏”。

本书虽然著录了圆形、方形的汉字印和非汉字印的图形印、荷兰文字印等等，但是没有钮图。

(二) 明治时代以后的研究史

6. 横井时冬《丝印之考》，《考古学杂志》（1897年）

进入明治时代，“丝印”研究开始受人关注。横井时冬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史学会杂志》第14号上发表了《白丝割符考》，其后又在明治三十年（1897）的《考古学杂志》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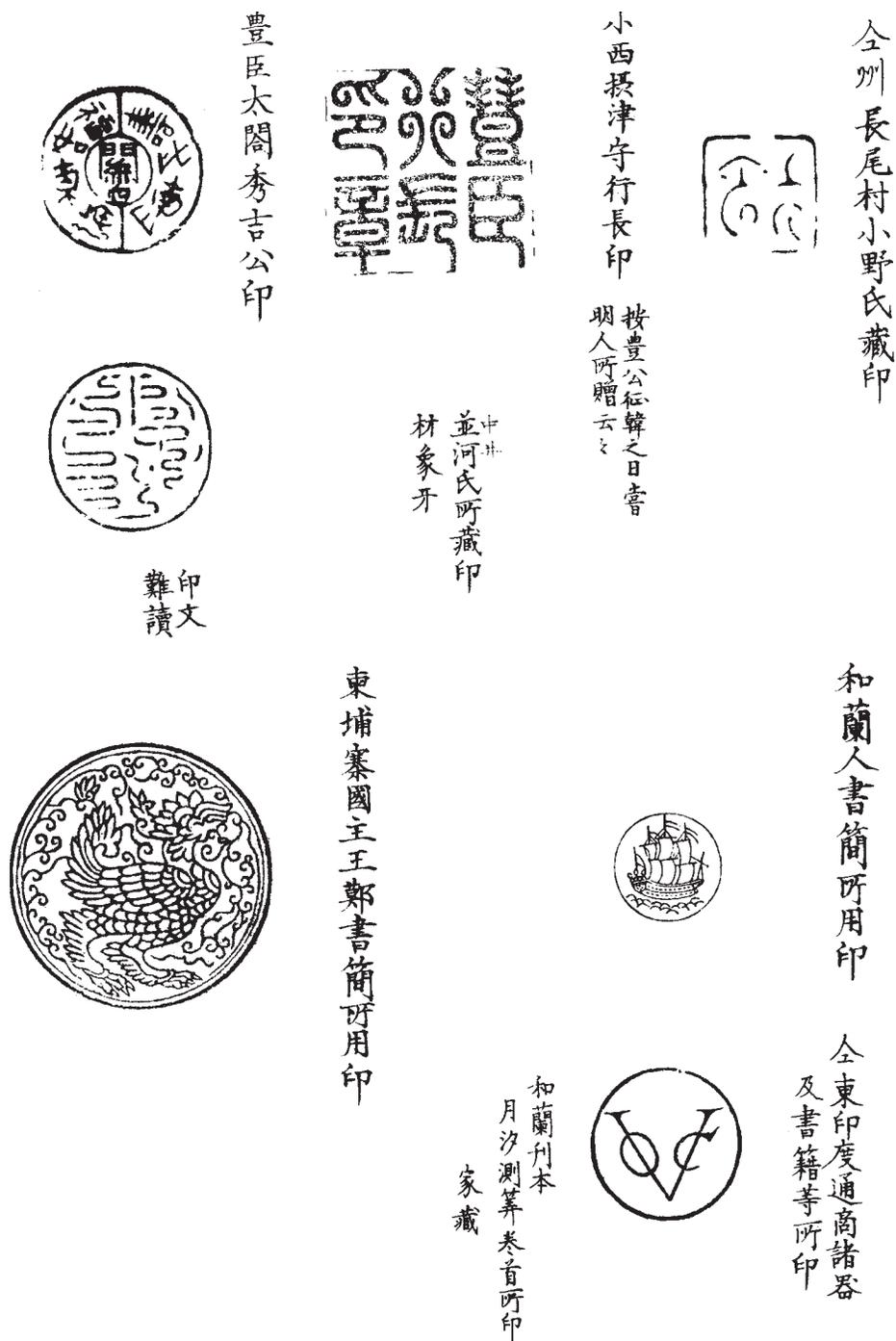


图6

表了《丝印之考》。本文开头引《国史大辞典》介绍了“丝印”的概要，其中的基本概念可以说就是以这位横井时冬先生的观点为基础而形成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横井时冬被认为是关于“丝印”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倡导者，有时还被错认或误解为“丝印”的命名者。有关这些方面的讨论，下文还会涉及。此外，明治三十七年（1904），山中共古发表了《丝印名称考》（《集古会志》）一文。

7. 三村竹清《丝印百钮》（1908年）（图7—9）

横井时冬发表《丝印之考》后过了11年，也就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村竹清编写《丝印百钮》，第一次用图像来描绘钮形，并尝试按钮式对丝印作了分类。三村尝试通过各种不同的钮式判断印影的所属，笔者对他的研究成果作了整理，这里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9种钮式略作说明。

图7的钮形是人物形象，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各种样式，所钤印的印文方向不一致，但可以看出印文有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混杂的情况。

图8的钮形是大黑像和骑马人物形象，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椭圆形等，印文也有汉字和图形混杂的情形。

图9的钮形是狮子等兽形类钮。印面除了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之外，还有八角形、梯形等形状。同一种钮形的印章，其印文分别有汉字和非汉字或图形。

通过描绘钮图，按钮形的区别给丝印作分类，从而作某些推断，这是之前尚未有过的方法，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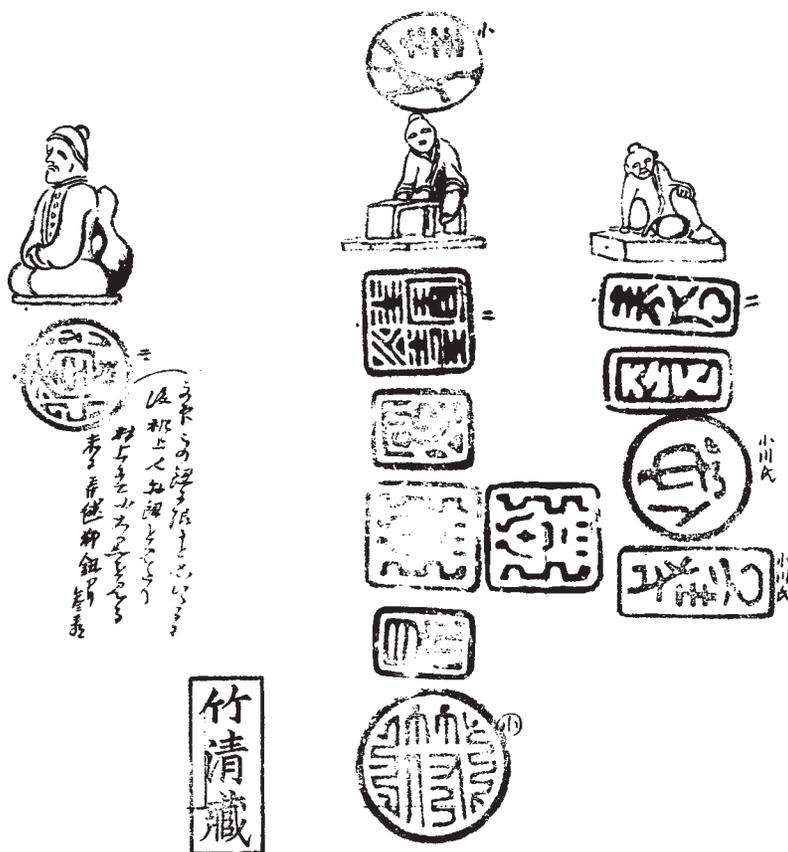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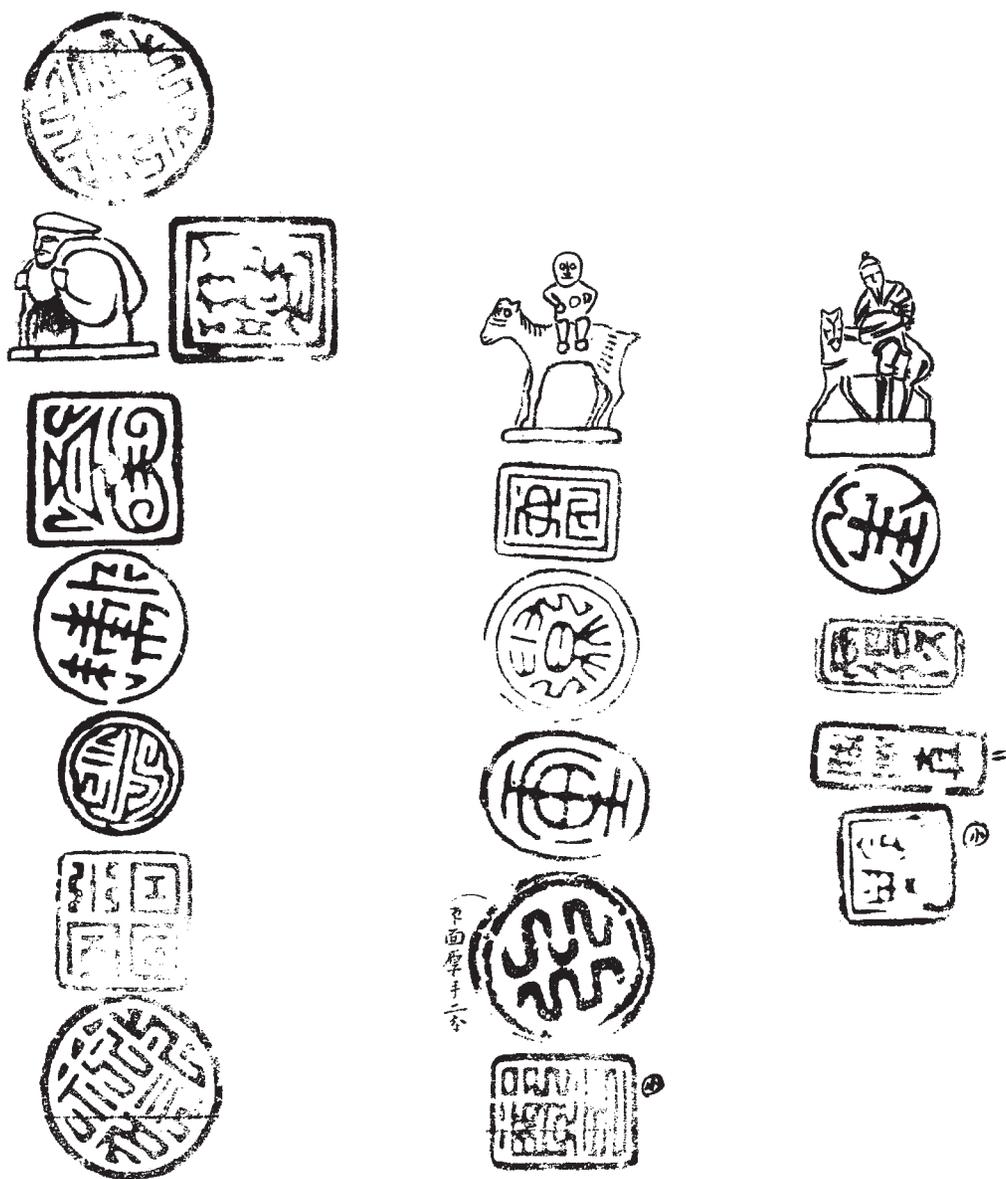


图8

值得关注。不过遗憾的是，还是没有汉字印的释文。

8. 吉木文平《印章综说》（1971年技报堂）

吉木文平的《印章综说》一书共分10章，其中的“印章的种类”设有“丝印”一项。作者对丝印作了概述，认为是“从足利时代末期到德川时代初期出现的特殊的铸铜印”。将丝印大致分成“人物钮和动物钮”，“印面的形状”则分为方形、圆形、长方形等，印文有“属于吉语印或与不同的图案印”，并分别介绍了有关其用途的几种说法，即中国丝绸收据印说、高丽印模仿说、从安南方面传来的玩具说等等，还用照片列举了“铸铜印‘丝印’的钮及印面例”和“被称为丰臣秀臣用印的关白印”等5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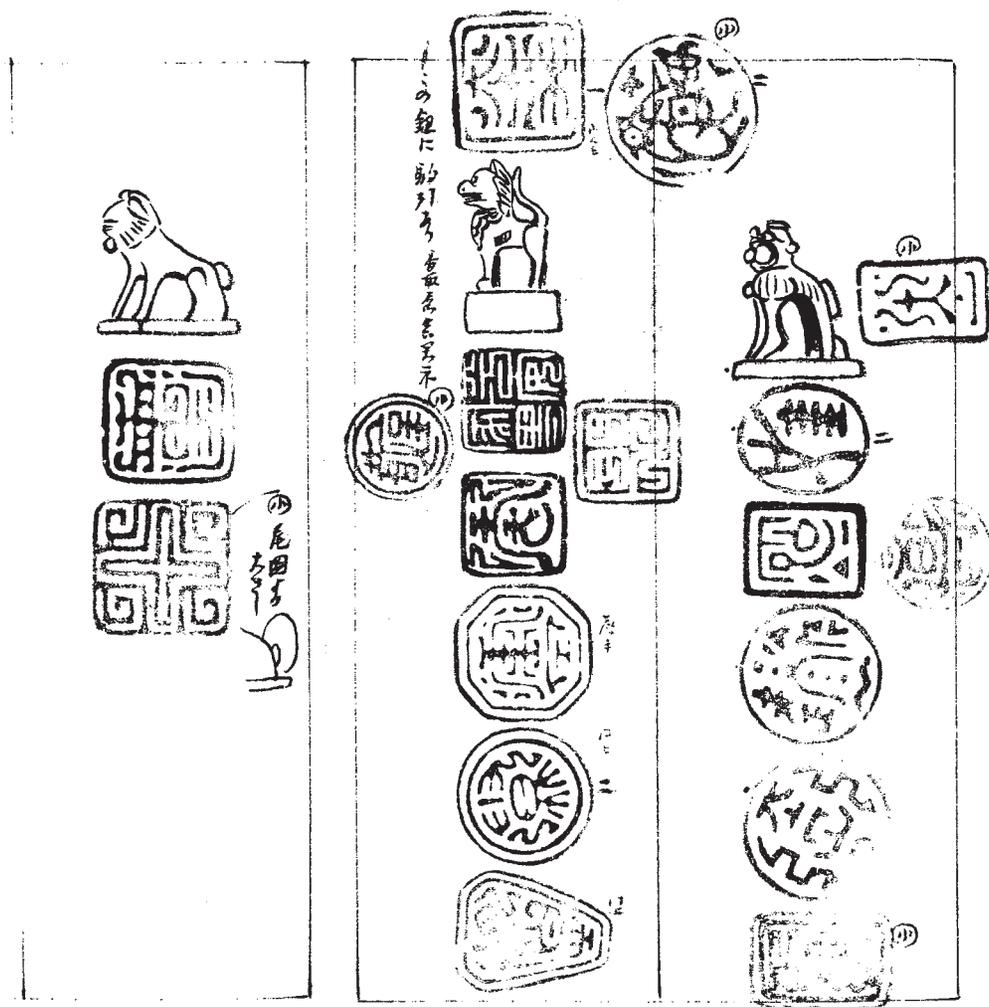


图9

9. 会田富康《铸金、雕金、锻金》（1975年理工学社）、《日本古印新考》（1981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图10—14）

在昭和五十年（1975）出版的《铸金、雕金、锻金》一书中，会田富康针对自横井时冬以来所流行的对“丝印”的解释，撰写了“坠子印及其他”一节，根据下列理由，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坠子说”：①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丝印。②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在通商时使用这样的丝印。③印文文字不能释读。④印面雕刻很浅，而且同一印面中混合了几种不同性质的内容，否定了“印章说”。⑤为了适合佩带而制作小巧（中心对齐类型是主流）。⑥钮上开有贯通的孔洞。⑦可以观察到因手的抚摸而造成的磨损。为了展示资料，作者利用照片介绍了“狮子钮”、“昆仑人钮”、“二人骑象钮”、“惠比寿钮”、“大黑钮”、“鲛钮”、“象钮”等等。作为金工大师，会田富康也谈到了印的铸造技术，认为印面和印钮是分别铸造的。

6年之后的昭和五十六年（1981），会田在《日本古印新考》的有关“丝印”一项中，对丝印作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整理出了二百几十种钮形，约十五种印面形状，约一百五十种印文。如图

「絲印」

人物鈕	約四十種	大黒鈕	約五種
蛭子鈕	約二種	布袋鈕	約二種
壽老鈕	一種	首鈕	一種
騎馬人鈕	約五種	象乘人鈕	約二種
杖衝人鈕	約二種	瓢背負鈕	約三種
膝抱人鈕	一種	崑崙人鈕	約三種
壇上半跽鈕	一種	肌脫	一種
半跽鈕	一種	その他	數種
獅子鈕	約四十種	象鈕	約十二種
猿鈕	約十二種	犬鈕	約廿七種
馬鈕	約五種	龍鈕	約八種
龜鈕	約六種	猪鈕	一種
鼠鈕	一種	牛鈕	一種
兔鈕	一種	羊鈕	一種
虎鈕	一種	鶏鈕	一種
鯰鈕	一種	異獸鈕	約六十種
器物その他	約五種		

以上鈕の姿は累計約二百數十種類にも達するが、この中で、江戸時代又は近時の模造も相當に含まれてゐるが、それ等は概して種類の少い異獸鈕に多い。が猪、鼠、鶏、切子、籠目、扁額、鯰等は模造とは見えない。印面の種類では、形が約十五種類、印文が約百五十種類である。この種以外にあるとしても、恐らく二三點を出ないであらう。

後の模造品は蠟型手捻りの丸物鑄物が多く、ナカゴを抜いた合せ型のはあまり見當らない、重量も相當に重く、仕上げタガネを使用しない鑄放のものが多い。しかしこれ等の印も、今後百年の後には模造の名稱を脱ぎ去つて、一種の鑄銅印として立派に扱はれるであらう事を考へると、この絲印それ自體も、かつてはさうした運命を一度ならず経て来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はれる。

214 213

图10

10所示，钮形中以人物钮、狮子钮、异兽钮等数量最多，其次是狗钮、猴子钮、大象钮等。

图11是12张钮形照片，分别列举了大黑天、蛭子、拄杖人、鸡、龙头、鼠、昆仑人、坛上人、骑马人、狮子、骑象人等。

图12的上面是鯰钮印章的照片。印面是长方形的，印文左行，为“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下面是可能与之有关的具有同一铭文的六棱“湖州镜”。

图13是12枚印章的印文，混杂有汉字印、非汉字印和图形印。很可惜每个印（坠子）都没有相关的释文或图形的解释。

图14是对丝印（坠子）的使用例的考察。分别介绍了大藏弥右卫门使用印及其所钤印的文书（1639）以及圆山应举（1733—1795）所用印等实例，很有意义。关白印和朝鲜印（蚯蚓印）不仅提供了印面照片，同时也登载了印钮的照片，可以说这是研究史上的一大进步。

像这样对印钮从人物钮到异兽钮作分类，并提供其照片，还对丝印的渊源与制作技法、使用目的（坠子说）、使用实例等作明确的论述，作为研究者，会田先生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

10. 荻野三七彦“丝印”《国史大辞典》第一卷（1979年吉川弘文馆）

如序言中所述，在会田富康发表上述两份著作之间的1979年，荻野三七彦在《国史大辞典》中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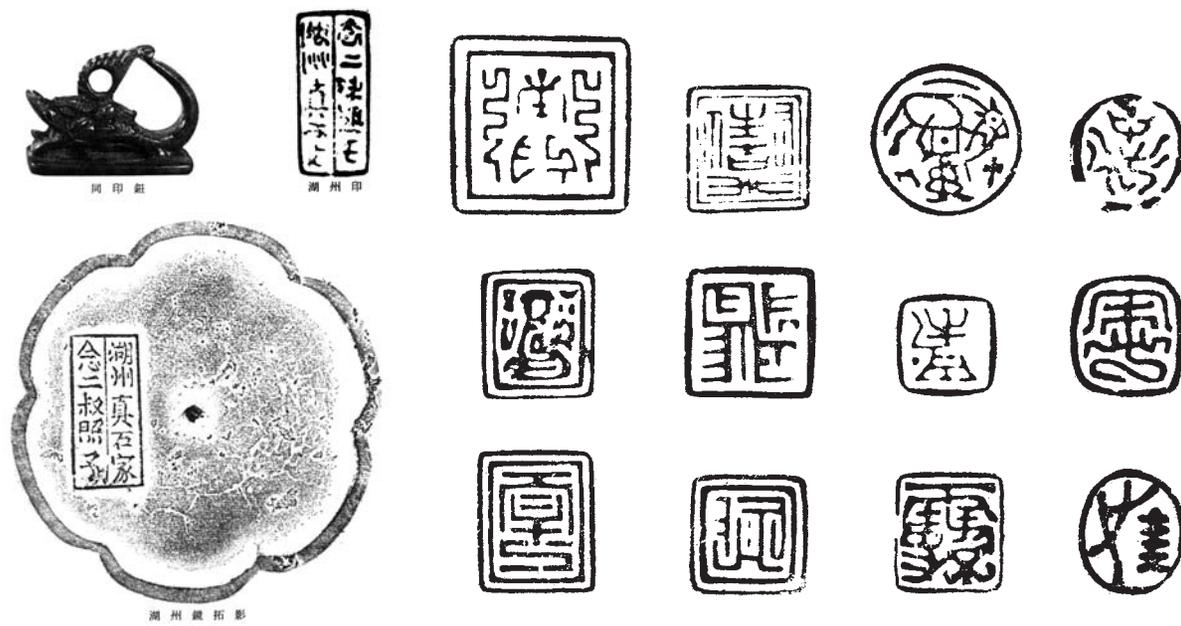


图12

图13



图14

概括性地介绍了与15世纪的明日（明朝与日本）贸易相关的“丝印”概念。同时他也说道：“虽然可以考虑丰臣秀吉的印章中其平生所用的正圆印就是这种丝印，但是由于印文无法释读，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改变通行的说法。这一枚秀吉的印的钮形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遗留的课题，但由于只有印文保存了下来，印章早已佚失，因此现在也无法弄清这一点了。”从中可以看出，他已预感到了丝印研究的困难以及今后研究的难题。

11. 新关钦哉《丝印之谜》，《史窗余话》（1979年吉川弘文馆）

同为1979年的《国史大辞典》第一卷所附录的《史窗余话》，收录了供职于外务省的新关钦哉所撰写的《丝印之谜》一文。新关从“在伦敦光一个坠子便卖出了75000美元（1350万日元）”说起，他本人也收集了大量的丝印。对于“丝印”，新关与之前的会田富康的见解不同，他认为：①丝印是中国制造的东西，是随着足利末期与明贸易来到我国的。②丝印的用途是在收取货物时捺印所用，或者是用于证明原产地或产品质量的物品。③喜欢使用这类印章的人物有丰臣秀吉、石田光成、前田利长、毛利辉元、蜂须贺至镇等。④丝印许是坠子之祖，就应尝试从“丝印”的角度来作考察。

在之后的昭和六十二年（1987），《印章文化史》（PHP研究所）出版。在第五章《解开丝印

之谜》中，新关先生针对丝印的起源、进出口贸易与丝印、丝印与坠子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其后又在平成七年（1995）出版的《东西印章史》（东京堂）的第八章《探究丝印之谜》中，对丝印的特点、丝印的用途、丝印与明日贸易的关系、丝印与高丽印的关系等，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关内容收入了下文将介绍的富冈美术馆的《神秘的丝印》（1993年）一书中。

12. 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1993年富冈美术馆）（图15—18）

平成五年（1993），在富冈美术馆开馆十五周年纪念秋展期间，举办了名为“神秘的丝印”的印章展览。卷首所载的致辞称：“本馆的所藏市嶋春城的收藏中，包含有约三十颗丝印。这些形制小巧的铸铜印，曾经被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许多武将使用，小堀远州和狩野探幽也很喜欢，近年来也为川端龙子所爱用。它的魅力在于，虽然印面的文字和图形难以释读，但以狮子和惠比寿等形象制成的钮形却非常的风雅。这些印章，虽然有人认为是室町时代的进口贸易中随着生丝进口而输入我国的舶来品，但其实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因此，这种印章究竟从何而来，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些惹人喜爱的印章，究竟是何时何地制作出来？为什么有很多相同的印面和钮形？究竟是做成了印章模样的玩具？又或者是坠子？等等，都是这类印章的未解之谜。”本次展览的展品，不只限于富冈美术馆的收藏品，还包括了德川美术馆、三井文库、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以及其他个人收藏印等499颗丝印，这些丝印按钮形的区别分成了170种来说明。钮形分类方面，仿照了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村竹清《丝印百钮》的方式。

图15列举的是“骑马人钮”、“人物钮”、“寿星钮”等钮形的丝印。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形状。印文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

图16列出的是“狮子钮”、“象钮”等钮形的丝印。印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印文也是既有汉字，也有非汉字或图形。

图17列举的是“犬钮”、“鲰钮”、“丁钮”、“人物钮”等钮形的丝印。印面同样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印文也同样既有汉字的，也有非汉字或图形的。

尽管印钮通过照片来展示，印影更是采用漂亮的珂罗版印刷，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印文的释文以及对图形内容的解释。不过该书依然可以说是“丝印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之一。

出于更全面的考虑，本书收入了新关钦哉的《探究丝印之谜》（1993年）和大内丰春的《丝印及其周边》（1993年）等富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这里就从新关先生的《探究丝印之谜》开始，来介绍其研究成果吧。

图18是新关先生为了考察有关“丝印的用途”和“丝印和高丽印”等问题而使用的研究材料，不过只是择要作整理介绍。

图18-1是宇都宫的成高寺作为镇寺之宝而收藏的“天狗”印。这枚铜印上设计了擅长书法的和尚向天狗伸手，天狗作回礼的形象。据说将盖了此印的纸条贴在门口，可以避免火灾，而贴在人身上的话，则对于肩酸或跌打损伤之类有很灵的效验。印文有读成“天犬（天狗）”的，也有误读作“秦”的，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

图18-2是一枚“郑氏”印，来自于肥前的平户原藩主松浦家的收藏品。虽然有人推测其为中国明末人郑成功（1624—1662，明朝曾赐其“朱”姓，因此被称为“国姓爷”，其母亲是日本平户人）的私印，但因为同样印文的印章屡见不鲜，所以可能性不大。



5 騎馬人鈕
高 3.7



22 人物鈕
高 2.9



f
個人1



a
黑川1



d
個人1



a*
個人2



b
個人1



e
個人1



b*
黑川1



c
三井1



c
個人2



d
個人1



9 壽老人鈕
高 2.5



e*
個人2



c
三井1
個人1



a
個人1



d
個人1



b*
個人1

图15



图16



86 犬鈕
高 2.9



140 航鈕
高 2.8



f
個人1



a*
個人1



b
黒川1



c
富岡1



d
三井1



e
個人2



a*
個人1



153 丁鈕
高 1.8



a*
個人1



32 人物鈕
高 5.4



a*
個人1

图17



图1 「天狗」の印



图2 「鄭氏」の印

伊五國田方郡藍山於古成跡置次八年
丙辰地所得疑是此之類



图3 『集古十種』所載の印



图4 『不秋草堂印譜』収録の関白印



图5 関白印（徳川美術館蔵）



图6 「豊臣行長」の印



图7 小堀遠州の糸印（左）と
近衛信尹のを使用した糸印（右）



图8 狩野探幽所用印とその中の糸印（三井文庫蔵）



图9 高麗印（東京国立博物館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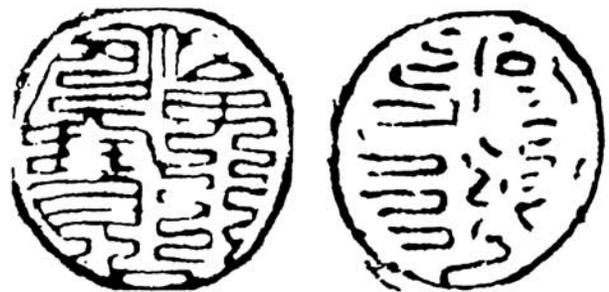


图10 高麗印（左）と秀吉の印（右）

图18

图18-3是松平定信的《集古十种》所收录的宽政八年（1796）在“伊豆国田方郡韭山於古城迹”中发现的八角印。印文不详。

图18-4是三村竹清所编《不秋草堂印谱》卷26“安田家藏印”中的“关白”印。印文的中心是“关白”二字，其四周环列“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八字。

图18-5是德川美术馆收藏的“关白”印章的照片，这是一枚印面直径达5厘米的大号圆形印章。作为能确认印钮形状的“关白”印章，该印弥足珍贵。

图18-6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有着“驮有灯笼状物的大象”钮形的一枚铜印，印文为“丰臣行长印章”。钤印出的印文是反写的文字，这一点很令人费解。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枚无钮的象牙印，印文也是“丰臣行长印章”，捺印出的印文则为正写文字。

图18-7是关白左大臣近卫信尹（1565—1614）所使用的丝印，以及庭园大师小堀远州（1579—1647）所使用的印章，分别是朝臣和茶道家所用，印文不明。

图18-8是狩野派的创始人狩野探幽（1602—1674）所用印章，收藏于三井文库。

图18-9和图18-10是为考察与丝印的关系而搜集的高丽印（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印钮和叠篆印文资料。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丝印与高丽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印章。

13. 梅舒适《丝印集英》（2005年日本篆社书法篆刻研究会）（图19）

梅舒适是日本篆刻家协会理事长，也是西泠印社名誉理事，他于平成十七年（2005）出版了《丝印集英》一书，用珂罗版的印刷展示了他所收藏的66颗丝印，并附有其撰写的《丝印诸说及考正》。梅先生从开始篆刻时便对丝印有了兴趣，分别从博多、京都、福井等地搜集丝印。他所收藏的印章分为汉字印章以及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两大类，印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等多种，与图19一样，这里只刊登其中较为典型者。上面是汉字印，下面为非汉字或图形印，其中汉字丝印并未附释文。

14. 久米雅雄《关于“大坂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1997年）《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大阪府茨木市、箕面市所在彩都（国际文化公园都市）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综合调查报告书》]（1999年），《亚洲印章史概论》（2008年；2012年；2016年）（图20、图21）

作为大阪府教育委员会文化财产保护科的专职人员，久米雅雄曾从事考古发掘调查以及国宝、重要文化财产、大阪府指定有形文化财产等美术工艺品的调查，其后受聘为大阪艺术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平成九年（1997），久米雅雄发表了名为《关于“大坂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或为吉利支丹大名遗产》（《立命馆大学考古学论集I》）的论文，为了探究从“大坂城遗迹”出土的“大坂夏之阵”（1615年）的烧土层以前的武家屋住宅遗址发现的印章（图20上面）的历史特点，将江户初期以前的“大和古印”、“禅僧印”、“画人印”、“进口贸易印”、“武将印”、“罗马字印”一起作为材料来作“丝印”研究。如图20的中间，介绍了“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常印”（“南斗”）等汉字印章，以及“外国人物”那样的非汉字或图形印章。

两年后的平成十一年（1999），久米雅雄发表了《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大阪府茨木市、箕面市所在彩都（国际文化公园都市）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综合调查报告书》]，在第五节《千提寺、下音羽中吉利支丹遗物的年代判定和历史状况》中，对从丰臣秀吉时期的大坂城遗址



图19

出土的罗马字印章“Dario（达里奥）”作了解读，并认为在同一时期的大坂天满本愿寺遗址出土的“坐着的女性形象”（图20下层）丝印，显然是耶稣会的“圣母子像”印章（这一认识的可信性，随着其后对高槻市安满磐手杜神社所藏的供奉品中的“一之马鞍”的坐木的调查而进一步提高）。平成二十年（2008），久米雅雄出版了《亚洲印章史概论》一书，其中的第十章《大坂城遗址出土的罗马字印章——高山飞驒守Dario印解读》中，如图20所示刊登了汉字印章以及非汉字或图形印章，图21则登载了“织丰时代的罗马字印章（样式变迁图）”（拙著《日本印章史研究》2004年）。

以上是江户时代、明治时代以来到现在的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

三、日本丝印研究的成果及存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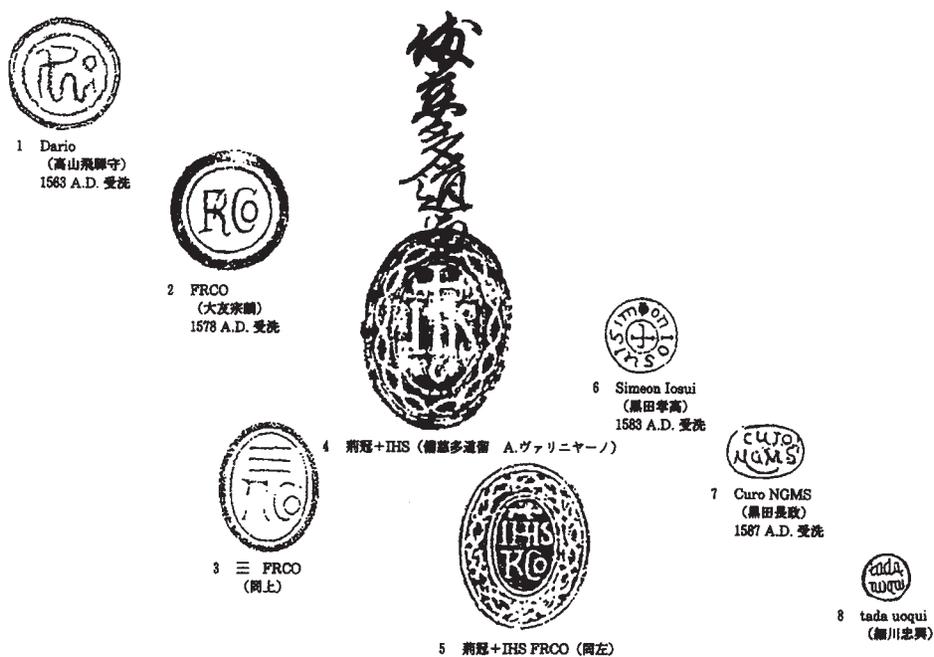
以上选取了日本丝印研究史上主要的研究者，分别是江户时代的安田箕山、田龙亭、高芙蓉、



图20

松平定信、长谷川延年等五人，以及明治时代以来的横井时冬、三村竹清、吉木文平、会田富康、萩野三七彦、新关钦哉、浅井京子、白取幸子、梅舒适、久米雅雄等十人，从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中摘出图版（一部分为久米雅雄选取原图作分类整理后所编），按照时间顺序作了具体介绍。现在将以上成果作简要总结，列举如下：

- (1) 日本的丝印研究开始于江户时代的18世纪后半叶前后。（《古铜印汇》1766年）
- (2) 当时只是被称为“古铜印”，还没有“丝印”这个名称。
- (3) 安田箕山、田龙亭等的丝印谱的编纂方式是将汉字印和非汉字或图像印不加区分地混在



織豊時代のローマ字印章 (久米『日本印章史の研究』雄山閣 2004 年より)

图21

一起。

(4) 虽然都著录了骑马钮、狮钮、虎钮等钮形的名称，但没有钮图，唯一的例外是松平定信的下总国大寺堀地所得印钮。

(5) 虽然安田箕山、田龙亭标注了“郑氏”、“封”、“同不害异不伤”、“莫”、“星”、“再拜”等释文，但之后除了“丰臣太阁秀吉公印”、“小西摄津守行长印”等一部分外，几乎没有附记释文的。

(6) 进入明治时代，横井时冬发表了《丝印之考》(1897年)，山中共古撰写了《丝印名称考》(1904年)，学界开始普遍使用“丝印”这一名称。

(7) 三村竹清将钮形图像作了系统整理，尝试以钮形为标准对丝印作分类(《丝印百钮》1908年)。这是里程碑式的工作，不过，还是缺乏汉字印文的释文，同时，汉字印和非汉字印也还混在一起。

(8) 昭和时代以后，会田富康开始刊布“丝印”钮形的照片，并分成二百几十种钮形，约十五种印面形状，约一百五十种印文，将湖州印和湖州镜联系起来，还拿高丽印与之作了比较。基本上否定了“丝印说”，而提出了“坠子说”，同时也注意到了在文书上按印的情况。(《铸金、雕金、锻金》1975年、《日本古印新考》1981年)

(9) 新关钦哉不同意会田氏提出的“坠子说”，认为丝印制作于中国，在足利时代末期，随着与明贸易输入日本，是在收取货物的时候按印以证明货物的原产地或品质的印章。战国时代的武将中有不少人喜爱使用，许是坠子之祖。(《印章文化史》1987年、《探究丝印之谜》1993年)

(10) 富冈美术馆出版的著作中,有浅井京子、白取幸子两位撰写的《神秘的丝印》(1993年)一书,其书将市嶋春城收藏、德川美术馆、三井文库、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以及其他个人所藏丝印共499颗,分成了170种。分类沿用了三村竹清《丝印百钮》的分类方式,即以钮形区别为标准来作分类,然后附上印文。在提供印钮照片及朱印印文的同时,还刊载了代表当时研究最高成果的新关钦哉《探究丝印之谜》以及大内丰春《丝印及其周边》两篇重要论文。即使这样,本书还是明确提出了关于丝印研究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惹人喜爱的印章,究竟是何时何地制作出来?为什么有很多相同的印面和钮形?究竟是做成了印章模样的玩具?又或者是坠子?等等,都是这类印章的未解之谜。”

之后,梅舒适先生接着出版了《丝印集英》(2005年)一书,这差不多是迄今为止著录了前后大多数丝印的著作。自1997年以来,笔者发表了相关论著,对自大坂城遗址出土的“Dario”罗马字印章作了解读,并对大坂天满本愿寺遗址出土的“圣母子像”印章进行了研究(这两个印章都是与丰臣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有关的吉利支丹印章),虽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但还是没有超出丝印研究的范围。在丝印的专题研究方面,正考虑撰写《日本丝印考》来作为开端。

正如此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迄今为止关于丝印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采取何种学术的、印学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的线索?做那样的尝试可以揭示什么?以下试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思考。

四、丝印研究之管见

以下是有关丝印研究的一管之见,分研究方法、汉字印章与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以及从钮形研究所作区别、丝印的渊源、丝印的时代性(铸造年代和流行使用年代)、丝印名称的起源、丝印的功能用途以及在日本的发展与变化。下面按照以上的次序略作说明。

1. 研究方法

江户时代以后的研究史表明,以往的丝印研究,开始于丝印的搜集和印文的介绍,以及对部分印章的材质、钮形、释文、图形作说明,由明治时代的三村竹清开始将钮形作图像化整理,会田富康开始进一步提供钮形、印面的照片,具有丝印资料集成性质的成果开始逐步积累起来。不过,由于明治时代以来的研究将钮形作为分类的标准,不采用将汉字印与非汉字或图形印作为两类来进行考察,因此形成了将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加区分的现状。

其实在“丝印”中,包含了汉字印与非汉字印两大类,这两大类都很重要。特别是汉字印章,对于非汉字的文字印章的考证能提供重要的文字信息。当然,除此以外,对于纯粹是图形的印章的考察并不适用,因为毕竟存在着界限。江户时代以后的“丝印印谱”仍然是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混杂在一起,不过,为了推进研究向前发展,笔者在调查了原本之后,将安田箕山的资料(图1)、田龙亭的资料(图2、图3)、高芙蓉的资料(图4)、松平定信的资料(图5)、长谷川延年的资料(图6)等,按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作了大致的整理分类后登载出来。明治时代以后的三村竹清(图7—9)等人的研究方法,是以钮形为标准来作分类,这样的结果是把汉字印章与非汉字印章混杂在一起。富冈美术馆的资料(图15—17)也与之相同。这些都不做加工保持原样予以刊

登。不过，有关梅舒适资料（图19）是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印章作了分类整理，用上下两部分分开登载。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同一钮形的“丝印”中，既有汉字印章，也有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印章，如同货币的铭文与图像那样不可分割，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要想成功地对丝印作综合研究，必须将汉字印章的考察，与非汉字或图形印章的考察以及钮形的考察结果结合起来。

2. 汉字印章的调查所得

丝印中的汉字印章显然占了多数。对印文内容略作整理，可以看出，“大明”、“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与时代和地区有关，“郑氏”、“关白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丰臣行长印章”是著名人物及吉语，“封”、“再拜”、“封信”与密封、通信有关，“同不害异不伤”、“同不害正异不伤物”、“不害正不伤物”具有平安祈祷、辟邪、护符的作用，“文行忠信”、“莫”反映的是道德和伦理观，“星”则可能暗示与宗教或信仰有关。受人关注的是，印文为“大明”、“湖州”、“郑氏”的，应该是中国印章，而印文是“关白”、“丰臣行长”等的，显然属日本印章。

3. 非汉字或图形印章的调查所得

非汉字或图形印章的数量也很多。其中可以分辨出含有中国元素的“龙”、“龙弄玉”、“庄周梦（蝴蝶梦）”等，带有基督教意味的“圣母子”、“十字”等，以及“驹引”这样的日本图形。像“荷兰帆船”、“荷兰VOC”、“柬埔寨国鸟”等印章，虽然不属于丝印，但因为反映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通商以及与柬埔寨国王的外交关系等，对于研究使用丝印的环境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可以推想，当时是一个超越了汉字文化圈的，包括中国、日本、欧洲、印度、柬埔寨等更广范围的国际舞台。

4. 钮形调查所得

钮形也能很好地反映文化的交流圈。钮形多种多样，分别有“龙”、“虎”、“龟”、“鯨”、“马”、“羊”、“狮子”、“昆仑人”、“骑象人”、“寿星”、“大黑”、“蛭子”等。从这些不同的钮形可以看出不同地域的特色，由此可以了解到亚洲丝印文化圈地域的辽阔。

5. 丝印系统的渊源（图22）

那么，这些拥有亚洲各地特色的“丝印”，究竟渊源于何处？以下尝试追溯其系统源流。

正如拙著《日本印章史研究》（2004年）一书所叙述的那样，在日本印章史上，自古以来的主流是“孤钮”和“苍钮”，中古以来是“花押”的时代，从室町时代开始到通过遣明船作“明日贸易”（1404年）以前，可称为“丝印以前史”，未见有丝印。直到天文十六年（1547）以前，从日本输出的物品有刀剑、硫黄、铜等等，而输入日本的则有铜钱、生丝、丝织品等等，在禅僧印、画家印、武将印中，很难看出丝印的谱系来，因此，丝印不可能起源于日本。

朝鲜有所谓的高丽印，但根据来自于会田富康的图14以及来自于新关钦哉的图18—10来看，无论是钮形还是印文，都不会是丝印的渊源所自。

丝印中，有大量“郑氏”、“封信”、“同不害异不伤”、“莫”等汉字印章。此外，在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中，也能见到像“龙弄玉”、“蝴蝶庄周梦”等描绘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或故事的印章。丝印会不会是发源于中国呢？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印章史重新作考察。

查阅中国印章，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翻开杨广泰编选的《宋元古印辑存》（文物出版社1994年），便能见到上面登载着与富冈美术馆图录所登载的“TS合字印”人物钮（图17右列下段）相似的人物钮，相关的著录为“印文：失，质地：铜，W.20g”。在孙慰祖所著的《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所附彩色图版4中，列举了同一类的2例人物钮，分别著录为“夹 辽”（印面长方形）、“李 辽”（印面八角形）。在孙慰祖所著的《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外文出版社2010年）中，对“辽代私印”的人物钮（契丹字“夹”铜印，上海博物馆藏）作了介绍（图22上段左边），这一人物钮与富冈美术馆图录所登载的“TS合字印”人物钮（图22下段左边）非常相似。

在孙氏《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所附彩色图版12中，刊登了一枚与梅舒适所藏的“兔”图形印（图19下段左端）非常相像的，也称为男女兄妹钮的铜印。上面提到的《中国印章》中，也登载了一枚著录为“元，八思巴字‘福’印，上海博物馆藏”（图22上段右边）的印章，其钮形与梅舒适氏所藏的“兔”图形印（图22下段右边）相似。由以上这些材料可知，丝印的渊源可追溯至辽宋元时期，丝印不只有汉字印章，也有非汉字或图形印章（其中包括丁钮的“圣母子像”印章，图17右列中段）。到了明代，虽然政权有所更迭，但其历史文化的本质与组成却并没有根本地变化，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的局面还继续存在着。这一点对于解开中国印章与“神秘丝印”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基本可以肯定，丝印的源头，应该是辽宋元以来具有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传统的中国印章。汉字丝印和非汉字或图形丝印的特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6. 丝印的时代性：制作年代和流行年代

那么，怎样才能判定丝印的时代性呢？对于其时代性，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分别作考察，即（1）铸造或者说是制作年代；（2）流行年代（使用年代）。对于流行年代来说，特别要注意区别对待“丝印在当时社会的具有实际功用”还是“纯粹出于兴趣而被看作珍贵的收藏对象”两种不同的情况。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国史大辞典》上有关“丝印”的定义那样，人们一般认为丝印的年代为“十五世纪，从中国的明朝随着生丝而输入”，但是如果从丝印的渊源作考察，便可以发现其年代相当于宋日（宋朝与日本）贸易以后至明日贸易期间。

自从平安时代的12世纪后半叶时平清盛（1118—1181）为了牟利，整理濑户内海航道，修筑大轮田泊港口，承认自由贸易以来，宋日之间的贸易随着渡宋船的增加以及金、硫黄、刀剑、漆器等产品的输出，输入了大量织物、香料、陶器、书籍、铜钱等。

明日贸易是通过室町时代的勘合船（指持有日本政府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的遣明使船）所进行的贸易。15世纪初的1401年，足利义满（1358—1408）开始派遣遣明使。1404年，由明使带来所谓的“勘合符”。此后，凡是幕府正式派遣的船只都携带勘合符而航行，因此与之相关的贸易也被称作“勘合贸易”。应仁之乱（1467—1477年）以后，拥护大内氏的博多商人与拥护细川氏的堺商人大量从事于此。1523年后则被大内氏独占其权益，一直到1551年大内氏灭亡。输出品有刀剑、硫黄、铜等，输入品则有铜钱，后来变成生丝以及丝织物等。

16世纪后半叶的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初期，由丰臣秀吉开始而为德川家康所继承的持有朱印状（指导国渡海朱印状，持此可允许出海贸易）的朱印船贸易，迎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京都、堺、长崎等地的商人以及西国大名、幕府官员热衷于此，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著名的有暹罗大城的山



图22

田长政（？—1630）等]则负责卸载和推销货物。当时出口的是银、铜、硫黄、樟脑等，进口的是生丝、丝织品、棉织品、鹿皮、砂糖等。航行所及则有今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中国等地。然而，随着宽永十六年（1639）的“锁国完成”，这样的贸易也走到了尽头。在此期间的1604年，以堺、京都、长崎以及后来的江户、大坂的商人为主，创立了名为“丝割符”的生丝进口制度（将进口的生丝定好价格统一收购，然后再分配给每个商人）。不过，到了1655年，“丝割符”制度被废止，改为直接交易。1685年又再度实施“丝割符”制度，前后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由此可见，从15世纪开始到17世纪，是丝印的兴盛期，其间特别是自丰臣秀吉时代到德川

家康时代达到高潮，也就是说，自16世纪的后半叶至17世纪的前半叶是其全盛时期。自德川家光（1604—1651）的宽永锁国以后，与其原始的性质相比，丝印虽然渐渐有所改变，但还是继续存在使用着。

上述观点，由丝印上所铸的“王朝”名以及“人物”名等材料基本可以证实。例如图2的铜印虎钮“大明”表明的是王朝名；图2的铜印骑马钮国姓爷“郑氏”、“关白”丰臣秀吉公印、图4的铜印人马钮“郑氏”，图5的“丰臣行长印章”等，显示的是当时的执政者或有名的人物。另外，当时爱用丝印的人物，则分别有图14的大藏弥右卫门，图18的近卫信尹、小堀远州、狩野探幽，这些都是活跃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人物。

不过，图14中的圆山应举是一位生活在享保至宽政间的人物，其时距离丝印兴盛期已过去了约100年。这一时期的丝印，正如安田箕山《古铜印汇》（1766年）以及田龙亭《古铜印谱》（1772年）中所命名的那样，被称为“古铜印”。与当时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铜印”不同，“古铜印”已完全脱离实际的社会活动，只是被当成了珍贵的收藏对象而已。虽然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实际功能的丝印”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收藏对象的丝印”，最终都会“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同一范畴”，但是，分清那样的差异，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态度与见识。应该注意的是，16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17世纪前半叶“锁国完成”以后，在日本改变了功用的丝印，具有了更多的内涵。

7. 丝印名称的起源

丝印名称的起源究竟如何？正如在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中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被称之为“丝印”的这种物品，在江户时代的安田箕山《古铜印汇》（1766年）以及田龙亭的《古铜印谱》（1772年）中，都被命名为“古铜印”，高芙蓉《芙蓉轩私印谱》（1786年）则称之为“铜印”，而“丝印”这样的名称，在当时还难以见到。明治时代以后，横井时冬《丝印之考》（1897年）、山中共古《丝印名称考》（1904年）、三村竹清《丝印百钮》（1908年）等著作中开始出现“丝印”的名称。因此，将“丝印”这一名称误解为由明治时代以后的学者、研究者所命名的新名称，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同大内丰春先生在《丝印及其周边》（1993年）中指出的那样，丝印名称起源于明治的说法是错误的。翻开日置昌一所著《“话”之大事典1》（万里阁1951年）一书的“丝印之始”部分，可以看到如下解说：“从明朝进口生丝作为织物的原料时，开始在每一斤丝上添加一个铜印作为交易的凭证，因为其形状和字体都非常风雅，其后也多被用作文具。”其后又引用江户川柳的“有丝印的桌子的一侧有猫在午睡”（天保）作了进一步的介绍。由此可知，在天保年间（1830—1844），“丝印”这一名称已经在普通百姓间广为使用。由于这位川柳所描写的是“桌子上面放着丝印”，因此，可以看出丝印已失去了原来用以验证的功能，而被视同文具放置于身边的事实。丝印这一名称，并不是明治之后才被命名，而是早在江户时代便已存在。同时还可以看出，丝印这一名称，实际上是一个反映了其在生丝进口过程中所具有的原有功能的名称。

8. 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及其在日本的发展与变化（图23—25）

下面想要说明的是日本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及其在日本的变迁等方面的相关要点：

（1）由于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丝印”这样的名称，因此，这种铸造印本来与“生丝”的进

口有关，这一事实在已经是广为人知了。

(2) 根据印文作“大明”、“湖州真石家”等字样的丝印，可以推断，丝印曾作为明代生丝中品质最好的“湖丝”产地“湖州”方面的品牌标志。

(3) 可以在《资治通鉴》等书中见到的“同不害异不伤”、“不害正不伤物”等字样的印文，很可能是祈祷贸易过程中的航海者及货物安全的护符印。

(4) 印文为“封”、“再拜”、“封信”、“符”等的丝印，应该是在具体的书信、勘合符、丝割符等上面所使用的印章。

(5)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文行忠信”、“莫”之类的印文与吉祥语、伦理道德以及禁忌有关系。

(6) “圣母子像”、“十字”等印章应该是基督教的宗教印，而“星”印或“由海蛇座的七星组成的南方星宿”印，也可以认为属于宗教印。

(7) “关白”印章（羽柴秀吉的关白任命在1585年，其太政大臣的任命以及赐姓丰臣则在1586年）、“丰臣（小西）行长”印章（行长为堺地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是秀吉的心腹，也是吉利支丹〔即日本天主教徒〕大名之一）、“郑氏（郑成功）”印等为姓名印章的一种。不过，由于这一类的丝印往往有多颗印文相同者同时存世，所以可以推断这些印章并不是当时人一般使用的印章，而是“关白”、“小西行长”、“郑成功”等人对于其心腹之人“论功行赏”时所一起赏赐之物（与当时秀吉等赏赐金银时的情形一样）。

(8) 在日本，有被尊信为可以带来福佑的“七福神”。钮形中的“大黑天”，是印度的印度教中的西瓦神（Mahaa-kaala）化身与日本的大国主神结合的产物；而“寿星”，则是道教之神，即由南极星化身的南极老人（即日本的白须明神）；“蛭子”是指生活在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之间的“大渔追福”之神，这些都是与保佑商业繁盛及五谷丰登有密切关系的神祇。此外还有“昆仑人钮”，所有这些都深刻反映出当时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思想、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交流与传播。中国的“龙弄玉”印，与“求雨”有关，而日本的“驹引（驹牵）”印，应该是与江户时代出现的“绘钱”（指日本民间为祈求钱财而制作的铜钱形物）中的“驹引钱”（祈求财源广进的民间信仰）出于同样想法的东西。

(9) 有关丝印的功能与用途在日本的变化，下面利用一些近年发现的材料作几点补充。

图23是平成三年（1991）发掘的大阪府阪南市所在饭之峰畑遗址出土的狮子钮铜制丝印，印文作“莫”，与16世纪后半叶的禁忌有关。

图24的上段是大阪府高槻市所在安满磐手杜神社的“一之马鞍（青贝水平鞍）”和坐木下的年代和雕印。图24的下段，是大阪市《天满本愿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1995年）作为“坐女像”介绍的丝印（印面直径为2.4~2.6厘米，高度为1.8厘米，长方形板状的底座上带有扁平的钮，上面有直径约3毫米的孔），所附印文虽然有着白文和朱文的区别，但应该是同一个印的印面与钤印。说到高槻，自元龟三年（1572）以来，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1552?—1615）作为高槻城主的领地，直到天正十三年（1585）转封为明石城主，这里一直是其活动的中心区域。右近先后服事过荒木村重（?—1586）、织田信长（1534—1582）以及丰臣秀吉（1536—1598）。右近Justo的父亲是高山飞驒守Dario（?—1596）。高山右近于天正十五年（1587）因丰臣秀吉颁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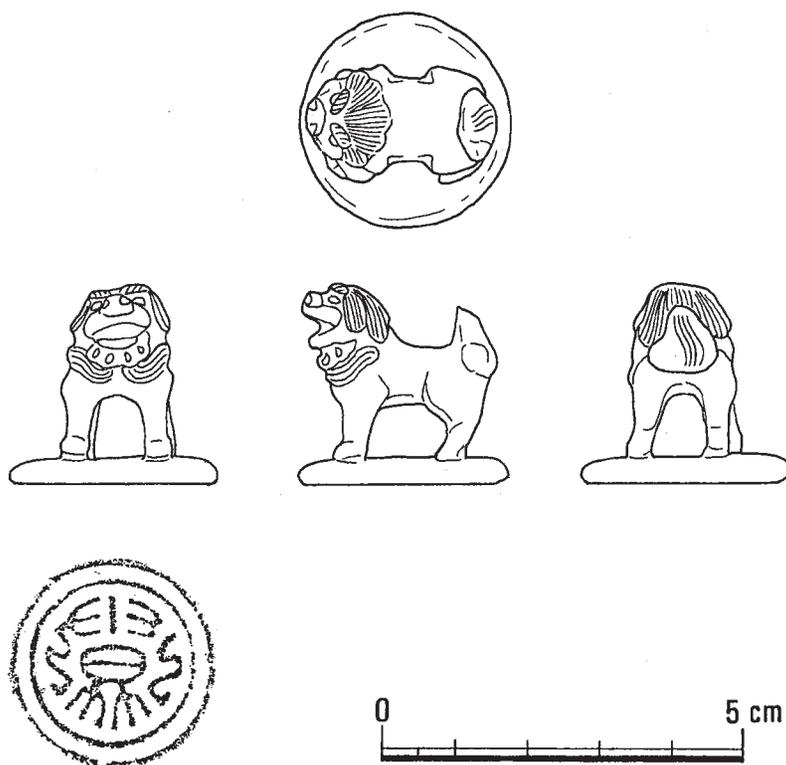


图23

“传教士驱逐令”而被除封。到了庆长十九年（1614），又因江户幕府的德川秀忠（1579—1632）禁教法令而被流放到马尼拉，第二年因病去世。带着高槻磐手杜神社所收藏的庆长十三年（1608）的“圣母子像”雕印（白文）的“一之马鞍”的奉献物资料，是当时的大名级隐藏的吉利支丹遗物，因而被认为是珍贵的雕印。“圣母子像”为供奉者是吉利支丹这一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图25是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供奉西国叁拾叁所纳经》上捺印的大阪府和泉市卷尾山大悲殿“佛法僧宝”印章和施福寺执事的“莫”字印章。阪南市出土的狮子钮印钤印出的同样的“莫”字，只不过上下颠倒了。这恐怕只是与钮的前后方向相关，比如狮子钮按头上尾下的方向捺印的结果吧。这可能是古老罕见的“丝印”被赏玩，并作为执事印而被使用的例子吧，毕竟“莫”字能让人想起宗教方面的禁忌。

五、结语：今后的课题与展望

“日本丝印考”这一课题，叙述了日本丝印研究史概要、丝印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及有待解决的问题，介绍了笔者关于丝印研究的一些认识，即将汉字印章和非汉字或图形印章以及钮形等诸要素结合起来作综合考察，据此可以具体了解丝印在日本的系统、时代性、名称起源、功能与用途以及丝印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自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可以算第1期，江户时代初期从“锁国完成”（1639年）开始到幕府时代末年向美国、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开埠时代则为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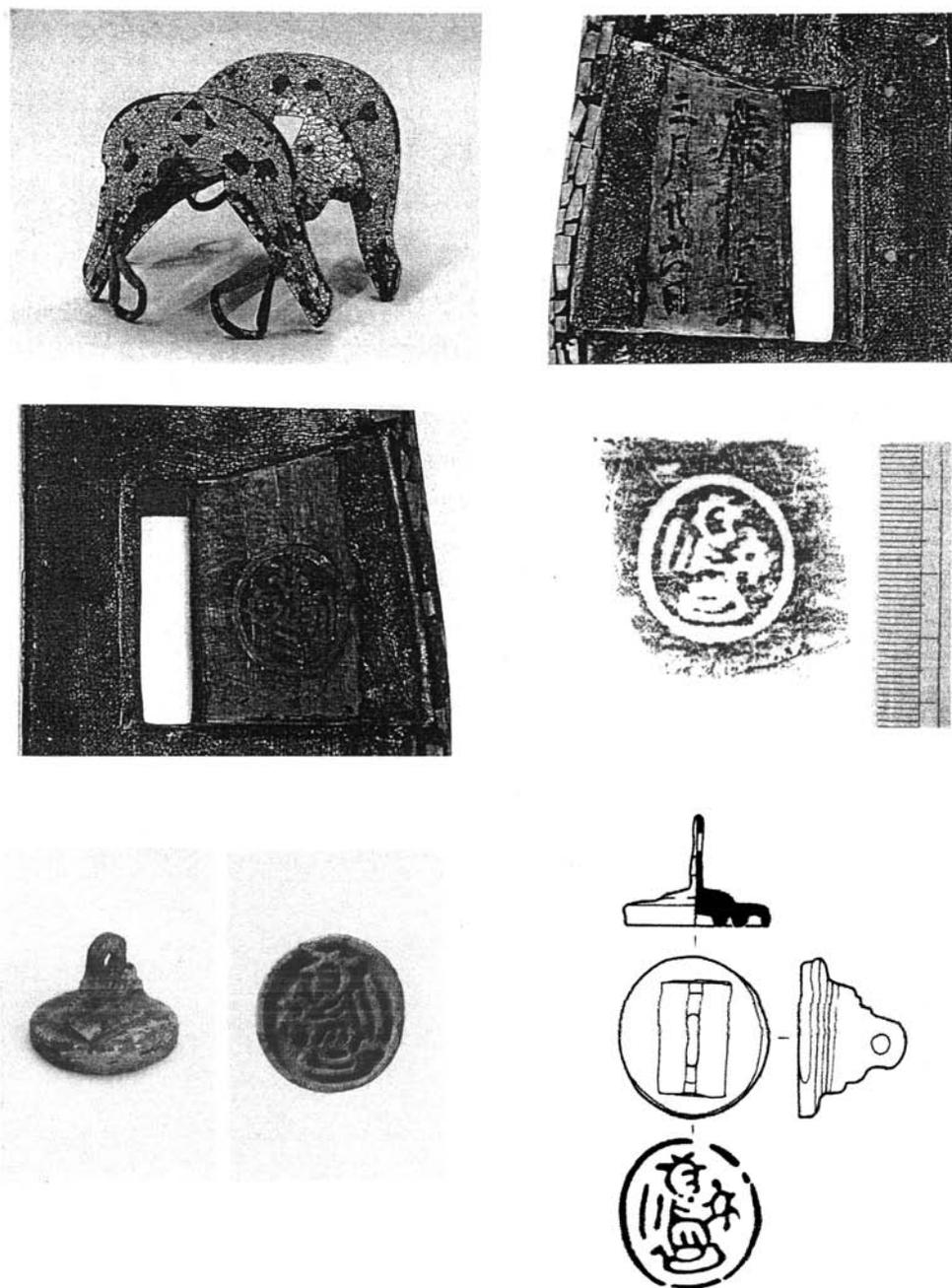


图24

19世纪60年代的幕府时代末期开始到明治时代以后可以称第3期。随着以勘合贸易、朱印船贸易为主的时期向锁国时代的发展，丝印也逐渐演变成为具有日本意味的物品。丝印的使用，包括姓名印与赏赐品、贸易印和通信符、为自身与物品的安全祈祷的护符、吉语印、宗教印等等，无不与日常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或被作为与七福神有关的祈求财富的器物，或被作为书镇使用，甚至作为坠子的原形。

根据大英博物馆刊行的《Netsuke》（2014年），坠子开始出现，应该是18世纪以后。早期的制作者，如京都的正直、冈友，大坂的根来宗俵等，在当时制作了以“福禄寿”、“龙与玉”、“象

与人”（无署名）等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丝印刻意制成钮形与印文相一致的样子。19世纪时，涌现出了如大坂的大原光广（1810—1875）、怀玉斋正次（1813—1892）、春江斋潮月（1826—1892）等制作大师，留下了“打哈欠的达摩”、“横卧的山羊”、“瀑布下的文觉上人”等作品。不过，坠子是没有印面的，即使坠子可能源自丝印，但要说坠子就是丝印，那是很难成立的。

作为今后的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有必要根据钮形来作详细的分类及编年工作。图22所示的孙慰祖先生著录的元代“八思巴文字 福”印，与梅舒适先生所藏的“兔形印”，虽然有着同样的“男女钮”，但精致程度完全不同，梅氏的藏品应该更晚，因此，钮形分类的精度也有待提高。（2）印文中的“不明文字”以及图形中的意义不明的“图形”有待作出解读或解释。（3）安田箕山的《古铜印汇》（1766年）、田龙亭的《古铜印谱》（1772年）都能附有释文，而高芙蓉的《芙蓉轩私印谱》（1786年）以后反倒都没有解说，今后，想必不会再有不附上详细释文的了吧。对已作出解释的满足与骄傲，不知不觉被那些未解的文字和图形消解了。今后，应该自觉为求得确切的理解与成果而持续努力。

最后，衷心祝愿印学能够日益发展，衷心祝愿印学研究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做出贡献。

（作者系日本大阪艺术大学客座教授、西泠印社名誉社员；译者系复旦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日]荻野三七彦：《国史大辞典》，日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2. [日]新关钦哉：《丝印之谜》，《史窗余话》，日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3. [日]安田箕山：《古铜印汇》，1766年版（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水田纪久先生旧藏本写）。
4. [日]田龙亭：《古铜印谱》，1772年版（同上）。
5. [日]源惟良敬撰：《芙蓉轩私印谱》，1786年版。
6. [日]松平定信：《集古十种》，1800年版。
7. [日]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1857年版。
8. [日]横井时冬：《丝印之考》，《考古学杂志》，1905年版。



图25

9. [日] 山中共古:《丝印名称考》,《集古会志》,1904年版。
10. [日] 三村竹清:《丝印百钮》,1908年版(二松学舍大学名誉教授大谷光男先生旧藏本写)。
11. [日] 日置昌一:《丝印之始》,《“话”之大事典1》,日本万里阁1951年版。
12. [日] 吉木文平:《印章综说》,技报堂1971年版。
13. [日] 会田富康:《铸金、雕金、锻金》,日本理工学社1975年版。
14. [日]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15. [日] 新关钦哉:《解开丝印之谜》,《印章文化史》,日本PHP研究所1987年版。
16. [日] 新关钦哉:《探究丝印之谜》,《东西印章史》,日本东京堂1995年版。
17. [日] 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日本富冈美术馆1993年版。
18. [日] 大内丰春:《丝印及其周边》,《神秘的丝印》,1993年版。
19. [日] 大阪市文化财产协会:《天满本愿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1995年版。
20. [日] 梅舒适:《丝印集英》,日本篆社书法篆刻研究会2005年版。
21. [日] 久米雅雄:《关于“大坂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立命馆大学考古学论集 I》,1997年版。
22. [日] 久米雅雄:《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1999年版。
23. [日] 久米雅雄:《日本印章史研究》,雄山阁2004年版。
24. [日] 久米雅雄:《亚洲印章史概论》,日本锡安印章文化研究所2008年版。
25. 杨广泰:《宋元古印辑存》,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6. 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7. 孙慰祖:《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
28. [日] 千田康治:《安满磐手杜神社所传马具调查》,《高槻市文化财2014年年报》。
29. [日] 田中早苗:《大阪府阪南市所在饭之峰畑遗址出土的狮子钮铜印》,2016年版。
30. [日] 高円宫妃久子:《坠子:方寸之间的日本传统工艺》,《大阪艺术大学平成20年度讲义录》,2009年版。
31. [日]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坠子:高円宫收藏》2011年版。
32. Noriko Tsuchiya “Netsuke”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图版说明

- 图1 安田箕山《古铜印汇》铃印
- 图2 田龙亭《古铜印谱》I 铃印
- 图3 田龙亭《古铜印谱》II 铃印
- 图4 高芙蓉《芙蓉山房私印谱》铃印
- 图5 松平定信《集古十种》铃印及印钮图(人物钮)
- 图6 长谷川延年《博爱堂集古印谱》铃印
- 图7 三村竹清《丝印百钮》I 铃印
- 图8 三村竹清《丝印百钮》II 铃印

- 图9 三村竹清《丝印百钮》Ⅲ 铃印
- 图10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Ⅰ 钮形表
- 图11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Ⅱ 钮形照片（大黑天、蛭子等）
- 图12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Ⅲ 湖州印和湖州镜
- 图13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Ⅳ 铃印
- 图14 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Ⅴ 丝印和高丽印
- 图15 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Ⅰ 钮形照片和铃印（骑马人、寿星等）
- 图16 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Ⅱ 钮形照片和铃印（狮子、大象等）
- 图17 浅井京子、白取幸子《神秘的丝印》Ⅲ 钮形照片和铃印（狗、鯨等）
- 图18 新关钦哉《探究丝印之谜》丝印和高丽印的爱用者
- 图19 梅舒适《丝印集英》钮形照片和铃印
- 图20 久米雅雄《关于大坂城遗址出土的圆形印章》《千提寺、下音羽的吉利支丹遗物》丝印、罗马字印、圣母子像印《日本印章史研究》《亚洲印章史概论》
- 图21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的罗马字印章样式演变图（久米雅雄《日本印章史研究》雄山阁）
- 图22 辽（契丹）·宋（汉）元·（蒙古）的铜印和日本丝印比较（孙慰祖《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富冈美术馆《神秘的丝印》，梅舒适《丝印集英》）
- 图23 大阪府阪南市所在饭之峰畑遗址出土的“狮子钮铜印 莫”实测图
- 图24 大阪府高槻市所在安满磐手杜神社所藏“一之马鞍和坐木下的年代与雕印”（上层）以及大阪市天满本愿寺遗址出土的“圣母子形象”（坐着的女性像）丝印（下层）
- 图25 大阪府和泉市所在卷尾山施福寺《供奉西国叁拾叁所纳经》所按捺的大悲殿“佛法僧宝”印章，以及执事所用丝印“莫”铃印（锡安印章文化研究所藏）